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编者按：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90年前那个金秋，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完成了一次举世闻名的伟大远征，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岁月无声，山河为证。90年时光流转，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正是为了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即日起，本版开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栏，追寻红色足迹，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敬请关注。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伟大实践

□陈雷刚 邓凯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伟大实践，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期间，党中央恪守革命定力，放弃固守苏区的被动策略，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领导权与军事路线问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极端困境中主动创造战机，传播革命火种，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战略主动、政治主动、思想主动、实践主动、价值主动，领导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伟大使命。

审时度势 牢牢把握战略主动

及时研判形势变化，科学分析敌我态势，是掌握战略主动的重要前提。1933年，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红军放弃擅长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堡垒战，导致部队伤亡惨重、节节败退，丧失战略主动权。1934年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大幅收缩，物资耗尽，各根据地遭到敌军分割“围剿”，相互难以支援，红军整体实力持续衰减。党中央全面研判敌我态势、准确把握斗争走向，清醒认识到，继续固守根据地，红军将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为挽救中国革命，党中央审时度势，毅然作出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伟大决策，以机动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奋力在绝境中开辟革命新局。

科学作出战略决策，是掌握战略主动的重要环节。长征期间，党中央常常依据战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进军方向。长征开启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北上和西进两条路线，意在调动和牵制敌人。然而，北上的红十军团因

举旗定向 坚定把握政治主动

政治主动是政治主体基于对历史大势、时代发展的深刻洞察，在重大转折关头自觉超前地调整路线、重塑格局、引领方向的战略能力。长征是一场对内重塑核心领导权、对外抢占民族抗话语权的双重政治行动，展现出强大的政治主动。

长征是党从艰难探索走向政治成熟的熔炉。对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实现正本清源，使党和红军有了坚强的“主心骨”。对外，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毅然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长征前夕，中央为由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赶印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资

料，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发出北上抗日布告。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发布《抗日救国宣言》等，将长征的军事行动与民族救亡紧密结合，以抢占道义与舆论制高点。通过对内重塑核心领导权、对外抢占抗日救亡话语权，党中央和红军不仅挽救了自身，挽救了中国革命，更为实现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开局铺平了道路。这是长征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政治智慧之一。

矢志不渝 始终把稳思想主动

牢牢掌握思想主动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先导和赢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密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胜利，是革命理想信念的胜利，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胜利。红军之所以能够顽强坚持、奋勇突围，既离不开革命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也得益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长征途中，党中央既开展革命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团结友爱、革命纪律、政策策略等教育，又坚决与“左”倾错误路线、张国焘分裂主义等作思想斗争。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长征胜利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长征期间，党中央和各级政治机关对红军将士开展了一系列“革命理想高于天”“铁心跟党走”和“正义事业必胜”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当红军抵达湘江，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同时，针对博古和李德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张国焘分裂

主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红军将士自觉抵制教条主义、坚决反对分裂主义，不断强化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共识，维护红军队伍的团结统一。此外，还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不断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当红军准备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总政治部及时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开展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等，以证明党和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当红军即将会师时，大力开展团结友爱教育，维护全军步调一致。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思想主动的重要载体，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攻坚克难 持续激发实践主动

历史主动的实践形态，就是创造性地解决时代问题、攻克难题、办成大事。长征不是简单的被动突围，而是高度自觉的实践主动。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以无畏的胆魄攻坚克难，在血与火中淬炼出制胜的斗争本领；以敏锐的判断主动创造战机，将偶然化为必然；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备足先手之策，将被动转化为主动，彰显了非凡胆魄、斗争精神和求变意识。

历史主动不是等来的，而是干出来的。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先后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创造了气吞山河人间奇迹。湘江战役中，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他愤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为苏维埃中国流尽最

后一滴血”。

遵义会议后，红军指战员主动应变、主动设局，创造性地将退却与进攻融为一体。在四渡赤水，用“走”来创造“打”的机会，不断调动和消耗敌人，最终变被动为主动。在乌蒙山回旋战中，红二、红六军团同样在敌阵中穿插回旋，忽东忽西、边走边打，通过伏击战打乱敌人部署，为自己赢得休整和补充时间。

长征途中，党中央居安思危、见叶知秋，积极应对重大危机。比如，从组织上逐步解除共产国际指派代表的领导指挥权，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改善军领导方式，破解中国革命和长征中最深层的领导危机；加强各路红军的战略协同与策应，通过佯攻贵阳与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例，扭转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战胜长征最紧迫的军事危机；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促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消除内部的分裂危机等。

依靠群众 充分展现价值主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动力来自人民。长征不仅是军事战略上的绝地突围，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境中实现价值主动的伟大升华。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历史。

在紧紧依靠群众中筑牢生存根基。红军过境粤北的长江镇、城口镇、红山镇等地时，有1000多人为红军做向导，帮忙磨谷、舂米、买菜、铺草。红军过雪山前，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辣椒、皮袄；过草地时，藏族同胞送来青稞、牦牛，教红军识别野菜、辨别方向。没有群众的倾力支援，红军恐难完成长征这一壮举。

在恪守群众纪律中彰显政治本色。广大红军每到一地，都严格遵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留下了许多秋毫无犯的好话。红军途经四川叙永营盘山时，面对漫山遍野红黄熟透、伸手可摘的橘子，红军战士没有一人采摘，有战士难耐饥饿，顺手捡起掉在路边的橘子，经提醒须遵守群众纪律后，立马将橘子放回地上，继续随队前行。1935年除夕，毛泽东在四川叙永县石厢子村民肖有思家借宿，部队启程时，他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用。

在充分发动群众中播撒革命火种。红军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为充分发动群众，党和红军每到一地就带领老百姓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取消苛捐杂税，并在革命氛围较为浓厚、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群团组织与武装部队，帮助群众保卫革命果实。为了消除一些贫困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群众对红军的误解，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制定了多层次、有指向的宣传动员策略，探索出一套发动群众的独特工作方法。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彝海结盟使得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成为红军用尊重唤醒民众的生动写照。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研判形势、统一思想、对内重塑核心领导权、对外抢占抗日救亡话语权、主动创造战机、坚持人民至上，成功开辟了一条从绝境求生到开创新局的胜利道路。长征的胜利用铁一般的事实昭示：唯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把握政治主动、把握思想主动、激发实践主动、坚守价值主动，方能在时代浪潮中永立主动之地。

作者简介：陈雷刚，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邓凯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一级主任科员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青年话思想

□贺建风 周玉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根本原因在于它并非是对生产力学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对生产力系统进行“全要素结构性重塑”与“效率革命”。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恰恰要从这两个维度同时发力：一方面，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素实现质态跃升；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技术扩散、形成边际收益递增，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三要素质变与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互为表里、协同共振，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完整生成机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力三要素实现质态跃升。一是劳动者向“数智复合型”跃升，从而催生出既懂前沿科技又熟产业工艺的复合型人才，促使劳动者知识结构在跨界流动中完成系统性重塑。如“数字工程师”精通算法又通晓产线，“产业科学家”洞悉实验室原理又深谙车间良率控制。二是劳动资料向“智能装备群”升级，催生出具备感知、决策、执行一体化能力的智能体，如智能机器人、工业互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何以形成新质生产力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范式审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之所以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根本原因在于它并非是对生产力学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对生产力系统进行“全要素结构性重塑”与“效率革命”。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恰恰要从这两个维度同时发力：一方面，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素实现质态跃升；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技术扩散、形成边际收益递增，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三要素质变与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互为表里、协同共振，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完整生成机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力三要素实现质态跃升。一是劳动者向“数智复合型”跃升，从而催生出既懂前沿科技又熟产业工艺的复合型人才，促使劳动者知识结构在跨界流动中完成系统性重塑。如“数字工程师”精通算法又通晓产线，“产业科学家”洞悉实验室原理又深谙车间良率控制。二是劳动资料向“智能装备群”升级，催生出具备感知、决策、执行一体化能力的智能体，如智能机器人、工业互

联网平台、AI大模型等新型劳动资料。科技创新成果直接嵌入产业装备，产业创新成果又成为新一代劳动资料，劳动资料在融合中实现代际更替。三是劳动对象向“数据与新材料”拓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极大拓宽了人类劳动的作用范围，产业创新产生海量生产数据与消费画像，科技创新将其转化为可计算、可训练的“数据要素”；数据作为新型劳动对象反哺AI研发，加速新材料、新工艺的发现。劳动对象在融合中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范式拓展。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三大机制驱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一是通过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堵点”，引导人才、资本、技术高效流动，消除资源错配，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通过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等新型组织，大幅缩短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推动先进技术快速普及，加速技术扩散，带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跃升；三是以数据和知识为核心的融合创新遵循“越用越智能、越迭代越高效”的正反馈规律，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能否

走向“深度”、产生“质变”，关键落在四个维度上：产业体系的升级、企业主体的强化、成果转化的畅通、产才融合的深化。

推动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跃升，以产业升级牵引劳动资料迭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成效，最终体现在产业能级的提升上，而产业能级的每一次跃升，都意味着劳动资料的整体性迭代。建议要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攻坚行动，针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困境，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数字化诊断，形成“诊断—改造—评估”闭环。聚焦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领域加大技术攻关与产业化投入，积极布局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以科技创新为产业注入“智能基因”，以产业创新为科技提供“应用场域”，在双向赋能中推动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让劳动资料在产业升级中完成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代际更替。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需求推动劳动者知识结构更新。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载体。建议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者”作用，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将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纳入协同创新网络，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企业支撑、中小企业跟进”的创新梯队；强化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

入、科研组织中的主导权，支持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面推广“联合基金”模式，由龙头企业与政府按比例共同出资设立联合基金，将产业“真问题”转化为科研课题，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让技术创新从源头对准产业需求。完善国有企业创新考核机制，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针对中小企业研发人才获取难问题，建立区域性研发人才共享平台和“人才飞地”机制，中小企业可按需“租用”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开展技术攻关。通过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带动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工程师走进产线、创新人才向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在解决“真问题”中完成劳动者知识结构的系统性重塑，实现从“操作型”向“创造型”的根本转变。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实现新价值，也才能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增长。加快培育壮大科技经纪人队伍，建立市场化佣金机制，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人员，完善尽职免责细则，消除“不敢转”的后顾之忧。围绕重点产业集群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用不起、用不上”中试服务的突出问题。健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机制，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

等科技金融产品，引导创投、私募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转化通道畅通了，技术扩散才能加速，边际收益递增才能成为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才有坚实的制度保障。

深化产教融合发展，促进三要素在人才流动中优化组合。人才是连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核心纽带，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黏合剂”与“催化剂”。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立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学科设置与产业发展精准匹配。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育壮大产教融合型企业，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政策，推动产业学院从“挂牌合作”向深度共建转型。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畅通人才在科研院所与产业界之间的双向流动渠道，完善兼职兼薪、离岗创业等制度安排，让科学家与工程师“同题共答”。当人才在科技界与产业界之间自由流动时，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随之流动，三要素的优化组合便在其中自然发生。

作者简介：贺建风，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广东省政协委员；周玉兰，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研究人员

注：本文系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与举措研究”（2026A1010020003）阶段性成果